

新編諸子集成

中華書局

太玄

集注

新編諸子集成

太玄集注

〔漢〕揚雄撰
〔宋〕司馬光集注
劉韶軍點校

中華書局

前言

揚雄（公元前五三年——公元一八年），字子雲，西漢思想家、文學家。出身於一個有貴族血統的小地主家庭，自幼好學，博覽羣書，尤好聖哲之書，爲人簡易佚蕩，個性內向沉靜，好深湛之思，心有大志，淡泊名利。早年嘗從著名學者嚴遵遊，受老、莊之學，奠定「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自叙）的思想基礎。中年至京，晉見漢成帝，屢上辭賦，諷諭極盛則敗、位極終危、默默者存、自守者全的道理，告誡人君應該「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以圖「子子孫孫長亡極」的萬世天下，但未得信用。晚年國家無道，政治腐敗，奸佞當塗，賢哲毀棄，揚雄遂退而草玄，總結自己一生所學所思及親身體驗，撰成太玄一書。揚雄深知「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崇言閔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故不以時人的譏嘲爲意，唯「竢知音之在後也」。可知，太玄其書實乃揚雄一生好學深思的結晶，是反映其思想的主要著作。

人們通常囿於太玄的表面形式，以爲太玄祇是模仿周易的卜筮之書，以艱深文淺易，

其實沒有什麼深刻的道理，這種意見幾乎成了定論。其實不然，祇要認真研讀一下，就會看到，太玄的主旨是在探討整個世界（天地人）的根本性規律（玄）以及個人順應這個規律以立身處世避禍趨福的問題。將世界觀和人生哲學融會在一起，這是太玄暨揚雄思想的特色，也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特色之一。表面上看，太玄論道談玄，距人事甚遠，其實它的意旨無一不是落腳於活生生的個人本位的人生問題上。在形式上，太玄確實模仿了周易，但它不僅是模仿，它還汲取利用了天文曆法等自然科學知識，建構出一個獨特的完整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結構體系。這種結構體系，在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以無可驗證的直覺為特色、以意義含混多歧的語言為載體的龐大灰色背景中，從某種意義上講，未始不是一個獨具價值的亮點。在思想內容上，太玄博取各種流派的學術思想因素，而以儒、道、易為主，綜會融通為一種新的思想學說。這種會通精神，在當時家法森嚴、門戶對立的氛圍中，誠屬難能可貴。從思想發展的邏輯綫索上看，太玄不僅承前，而且啟後，思想家如桓譚、王充、張衡以及葛洪、韓愈、陳搏、邵雍、司馬光等人，學術流派如魏晉玄學等均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太玄的影響。總而言之，透過太玄其書，我們可以看到揚雄其人好學深思、博覽綜會、雜而不亂、卓有創樹的學術與人格，益知太玄絕非毫無價值之書，同時也明確了太玄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應有地位。

無庸諱言，太玄確實形式奇特，語言晦澀，內容龐雜，思想幽晦。正因為如此，太玄纔成了中國歷史上素稱艱深晦澀而又毀譽懸絕的著作之一。前人站在不同的思想立場上，對太玄給予了種種褒貶毀譽，我們今天儘可不去糾纏其中。但我們既然仍要研究太玄，則對於其書的艱深晦澀就不能置之不理。因此，前人的舊注便對我們有了重要的參考價值。據現存的記載，早在揚雄親傳弟子侯芭之時，就已爲太玄作注了。自那以後，直至晚清，注家合約七八十人，然而保留至今者僅十數家而已，其餘皆已亡佚。在現存的注釋中，尤以宋代司馬光的太玄集注素爲人們推重。經過與其他注釋比較，我們覺得司馬光的集注確實深孚衆望。

司馬光（公元一〇一九年——一〇八六年），字君實，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自幼聰穎好學，手不釋卷，年二十便中進士。他在政治上穩重保守，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思想上，始終恪守儒家正統；學術上則嚴謹審慎，勤奮過人。王安石變法時，司馬光的主張不得採納，他便退居洛陽，率領同志，費時一十九年，編成歷史巨著資治通鑑。此外，他在音韻、文字學方面，也有很深造詣，集韻和類篇二書，都是在司馬光的主持下編成的。司馬光對於揚雄及其著作推崇備至，先後耗費多年的時間，分別爲太玄和法言作成集注，流傳至今，成爲今人閱讀二書不可或缺參考資料。

據司馬光的讀玄稱，司馬光原來也認為揚雄仿易作玄，似有畫蛇添足之嫌，後經精心研讀，纔理解到太玄的價值，將揚雄推崇為孔子之後第一人，「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這比韓愈所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的說法更進一步，將揚雄推到了極高的位置。他認為太玄的價值在於：若以易為天，則玄就是昇天的階梯，若欲昇天得道，則不可廢棄玄之階梯。他又說：「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為明也。」在他看來，太玄和周易一樣，都是用來維護聖人之「大道」的工具，豈可橫加貶斥而不問青紅皂白。劉歆、班固以及當時諸儒對揚雄太玄的微辭和攻擊，在司馬光看來，都是不可接受的。

司馬光為研究太玄，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據他在讀玄和集注序中講，慶曆中始得太玄而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儘管如此，仍不敢自信已經「盡契揚子之志」，自誠必須「比老終且學焉」。此後直到元豐五年，集注始成。在「疲精勞神三十餘年」之後，仍然十分審慎，以為「訖不能造其藩籬」。司馬光治學一貫穩重踏實，嚴謹審慎，太玄集注也充分體現了這種學風。正因為如此，司馬光的這部集注便具備了很高的水準和突出的優點，大體說來，約有如下數端。

一般人作集注，往往缺乏自己的深刻理解和明確主見，對於各家注說不能抉擇取捨，結果祇能是不分輕重，羅列衆說，繁瑣蕪雜，漫無條理，使得讀者深陷衆說紛紜的迷霧之中，身不由己而更加糊塗。司馬光的集注則不然，他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獨特見解，然後廣泛搜集前人舊注，認真分析比較各家的優劣長短，去其荒誕不經的成分，取其有理有據的因素，融會貫通，擇善而從，重新組合，確有脫胎換骨、點石成金之妙。與舊注相比，司馬光的集注確實能够釋疑去滯，簡明扼要，玄理昭然，貼切可信。即使後來各家注釋，亦不能超過司馬光的水平。我在校注太玄的過程中，參考過現存各家注本，對於司馬光集注的上述特長深有體會。司馬光在編纂資治通鑑時，面對形形色色的蕪雜史料，廣取精華，故能鑄成不朽巨著。他的太玄集注，在規模上當然無法與通鑑相比，但在吸收繼承前人成果方面，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司馬光的集注不僅注意解釋太玄的文意，而且注意從文字校勘方面整理太玄。自漢至宋，千餘年間，太玄一書產生了多種版本，這些本子之間由於流傳的源流不同，而產生了許多異文異音異義。司馬光之前，無人注意從這方面整理研究。嚴謹踏實的學風使得司馬光認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如果不把各本中的文字異同搞清楚，則將會使文義的解釋產生更多的分歧。因此，司馬光根據漢宋衷、吳陸績、晉范望、唐王涯、宋陳漸、吳

秘、宋惟幹七家注本，對其中的文字異同和異音異義進行了詳細校勘和記錄。這份資料對於後人的整理工作，具有十分寶貴的價值。這也是集注最具特色的優點之一。

上述七家舊注，今天除了晉范望的解贊之外，都已散失，正是靠司馬光的集注，宋、陸等六家舊注的一部分或片斷，纔得以保存至今。這對於後人研究漢魏之際的思想和學術，確實是一份重要的資料。

從另一個角度看，集注不僅是研究太玄的絕好資料，同時也是我們研究和了解司馬光的思想的重要資料。揚雄的太玄，曲折地反映了封建社會中下層知識分子在政治風雲變幻無常、個人命運坎坷多艱，而他們的思想、理論和主張又得不到上層統治者的理解和重視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苦悶惆悵乃至無可奈何的情緒，和他們雖然信奉明哲保身、順時待命的處世哲學，而又不甘久居人下，盼望能有一番作爲而出人頭地的思想矛盾。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受到排斥打擊，不得已，祇好退居洛陽，以編修通鑑爲事。但他於心不甘，仍思謀進取，希望能按自己的主張整頓政務，挽救國家。此時他的心情正與太玄中的情緒暗合，不免對太玄一書倍感親切。故他在集注中常常情不自禁借注諷時，暗中發洩自己的不滿和意見。這樣，集注便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司馬光的某些思想觀點。清代學者陳本禮撰太玄闡秘，謂揚雄草玄，其秘意全在刺莽。這種意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

上是受了司馬光借注譏時的啟發。

以上述說了太玄集注的種種特長，但這並不是說集注就是十全十美了。司馬光的集注，其最大的遺憾就在於它不是太玄的完注本。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司馬光祇爲太玄的前六卷即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測和玄首序、玄測序作了注，而留下後四卷即衝、錯、攤、瑩、捫、圖、數、文、告九篇文字不予作注。在今人看來，恰恰是這後四卷九篇文字更爲重要，所以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莫大的遺憾。比司馬光稍晚的許翰，字崧老（？——公元一一三三年），仿韓康伯注繫辭合王弼注六十四卦爲周易全書注之例，爲司馬光未注之後四卷作注，題爲玄解，合司馬光集注六卷始成太玄十卷全注本。但是，許解比之集注，太過簡略，又不易曉，有狗尾續貂之感。司馬光若地下有知，必不允其附驥千載。雖然如此，以其沿用既久，不便遽刪，此次校點姑存其舊。

另外，集注之中還有一些闕疑和不當之處。所謂闕疑，是指無注或缺注而明題「闕」字者。此「闕」字惟明抄本有，而道藏本、大典本、張士鎬本皆無。但據全部集注的情況看，這個「闕」字當是司馬光自題者，以示闕疑待考之義，這正是司馬光嚴謹踏實學風的一個反映，道藏等諸本刪之無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疑則闕之，這本是一種優點，但對後人來說，這些闕注的地方，往往正是不易理解的難點，故在客觀效果上講，這種闕注

又不能不是一種遺憾。至於注中的不當或欠妥之處，那更是任何一個注家和學者都不可避免的，我們豈可多加非難。正因為前人存有闕疑和欠妥之處，所以纔需要後人繼續努力！再者，從所謂闡釋學的觀點看，注者表達出來的意思與作者正文所蘊含的意思不能沒有差距，何況又是集取舊注之文參以己意而成的集注，其中出現一些重複牴牾參差不齊的情況，更屬理所當然，這一類的問題祇能依靠讀者在認真研讀時去發現和糾正了。

關於太玄集注的版本，現存的有如下數種。

一、道藏本，在太清之部內，祇有司馬光的集注六卷，而無許解四卷。道藏刊於明正統年間（公元一四三六年——一四四九年），點校所用乃民國十四年上海涵芬樓影印本。

二、明抄本，十卷，據書尾題跋，該本抄成最遲不晚於明弘治八年（公元一四九五年），所據何本已不可詳。前人多視之為宋抄，估計是明人據宋本影抄者。該本今藏於北京圖書館，定為明抄。有清一代太玄集注各種版本，皆出自此本，此類版本如五柳居本、孫澍增補本、子書百家本、吳汝綸點勘本、百子全書本、袁氏貞節堂抄本、臧在東抄本等，僅列其名，不一一介紹。

三、張士鎬本，六卷，明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刊，無許解，今惟北京圖書館有

藏，上海圖書館收有殘本三卷。點校所用即北圖所藏。該本似據道藏出，校其文字，多與道藏本同而與明抄本異。

四、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影印綫裝本永樂大典卷四九二四至卷四九三四錄有太玄全文及宋陳仁子、胡次和、林希逸三家注。其太玄正文用晉范望注本，胡注也是一種集注，其中錄有司馬光集注，而未錄許解。可惜這一部分已非大典原繕寫本，而是後人的傳抄本，故其版本價值已有所降低，但不失爲一種珍貴的版本資料。胡氏集注原書今有宋本殘卷（卷六窮首至失首次七）藏於北京圖書館，雖所剩無幾，但對校勘大典中的胡注及他本司馬光集注仍有重要參考價值。胡注成書約在南宋寧宗慶元元年（公元一一九五年）前後，距司馬光集注不過百年左右，是現存時間最早的關於司馬光集注的版本資料，故其價值不可忽視。

五、明萬曆二十六年（公元一五九八年）刻本。此本著錄於中國善本書總目，藏於山東省圖書館，我曾造訪該館，惜未得見原本。總目稱「太玄經集注六卷」，然又云「范注」，自相矛盾。因未見原書，故不詳究竟是何家所注。書在而不得見，憾莫大焉。

此次點校，所用版本即上述之前四種。因各本皆有訛誤衍脫倒錯，相比之下以明抄本較少，且爲全本，故以明抄本爲底本，用道藏本、大典本、張士鎬本及胡注殘卷對校前六

卷。後四卷許解，無他本可校，祇好用五柳居本作爲參考，斟酌文意，進行校改。五柳居本是清嘉慶三年蘇州書坊五柳居依據明抄本翻刻的本子。據書尾五柳居主人跋稱：「行款悉照原書，復浼顧君澗蘋重校一過，遇有疑似之處，仍存其舊，蓋慎之也。」這樣說來，五柳居本對明抄本未作任何改動。但今天校來，仍有不少異文，其中有的屬明抄本顯誤，如卷七玄測都序注「晝則陽推五福以類升」，明抄本「升」作「外」，五柳居本作「升」，又如卷七玄衝「毅敢」一段注中「此周公之所以獨見於眇綿者也」句，明抄本「此」作「北」，五柳居本作「此」，此類亦據五柳居本校改。此外還利用萬玉堂范望注本（明嘉靖六年刊）、諸子褒異叢書本（明天啟、崇禎間刊，僅一卷，乃太玄節錄）、太玄本旨（明葉子奇撰，明正德九年刊本）等進行對校，再參考有關資料，如許校所出他本異文、吳汝綸點勘批語、其他注說、考證及上下文意、反切等等，運用理校、本校的方法，綜合校考，此類情況都反映在校語中，不一一贅述。當然，底本顯誤，雖無其他資料對證，也可逕改，觀看校語，自然明白。

關於點校中的一些具體情況說明如下。屬於逕改不出校的有：揚雄的姓各本「揚」、「楊」不一，此統一作「揚」；「己巳巳」不分，各據文意定之；八十一首首數并其畫數偶有誤者，依其順序定之；個別音切「切」作「反」者；手寫簡體字、俗體字、避諱字；明顯的手

誤等。下述情況出校：底本誤脫衍錯而他本不誤脫衍錯，因據他本改補刪乙者；底本、他本文異而皆可通，且他本異文有參考價值，故不改底本而出他本異文者；底本有疑然無本據以決者。不改亦不出校的有：注中引書校以原文雖有省略而不妨文意者；後世通用而揚雄特意分別之字；各本全書正文與注文「於」、「于」不一，盧文弨以爲「經文通當作于」，今難斷定故一仍其舊者。此外，如底本不誤他本誤者，一律不出校以省繁。本書各本或名太玄集注，或名集注太玄，或名集注太玄經，今以明抄本爲準，名太玄集注。各卷之題各本亦不統一，今亦一依明抄本。

司馬光曾先後有讀玄、說玄、集注序三文，明抄本僅錄讀玄一篇，經與他本對校，發現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所載者誤處最少，故據文集重錄，並校以他本。惟文集題作說玄，今據他本改正。說玄則據永樂大典錄入，亦校以他本。集注序據道藏本錄入并校以他本。此三篇依寫作時間爲序放在全書之首。明抄本書後附有邢參、徐禎卿、錢大昕、唐仲冕等人題跋，此於了解明抄本的源流和價值很爲重要，故存而未刪。許解後的太玄曆據說是由「溫公手錄經後」，而且溫公集注亦一依此曆，故亦存之。此外由於司馬光集注中集取有漢宋衷、吳陸績、晉范望、唐王涯的注，故將陸績的述玄、范望的太玄解贊序、王涯的說玄從萬玉堂范本上轉錄過來，附在書後，作爲了解宋、陸、范、王的一點資料，同時也可幫

助讀者理解四家注。當然，轉錄時也據他本作了校正。

點校中，雖然得到各方的大力協助，基本將有關版本搜集齊備，但由於本人學力有限，錯誤和不當之處仍難避免，敬祈專家學者指正。

劉韶軍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讀 玄

司馬光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雄所云也。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小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

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一〕，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二〕，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畋者所以爲禽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異〔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揚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廈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昇天而廢其階乎？」

〔一〕「釋」，明抄本、道藏本、張士鎬本作「懌」。

〔二〕「角逐」，明抄本、道藏本、張士鎬本作「競」。

〔三〕「何異」，明抄本、道藏本、張士鎬本作「何以異哉」。

也。先儒爲玄解者多矣，誠已善矣。然子雲爲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